

第三章 美國報刊裡的“Chiang Kai-shek”——對於 *Time*, *Life* 與 *The New York Times* 的基本調查

本章以時代雜誌 (*Time*)、生活雜誌 (*Life*)、紐約時報 (*The New York Times*) 等三種美國報刊為對象，考察其報導蔣中正所呈現的基本輪廓，以及其報導所可能呈現的史料意義。一般而言，美國因素恆常滲入現代中國的發展史實當中，就某種角度而言，等於也是中國政治的參與者，因此我們選擇美國主流報刊進行重點式的考察。另一方面，學界研究蔣中正時，並非總能注意到外國報刊對其報導所起的作用，因此我們也希望透過初步的相關考察，達到拋磚引玉、擴展研究面向的效果。

一、時代雜誌 (*Time*)

做為「美國世紀」(American Century) 理念的提倡者，亨利·魯斯 (Henry R. Luce, 1898-1967) 旗下的雜誌群的確為他的宏願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尤其是人所共知的《時代雜誌》(*Time*)。從 1923 年創刊開始，這本周刊持續見證，事實上也參與了所謂「美國世紀」的塑造。另一方面，由於亨利·魯斯家庭的中國經驗 (其父為長老教會牧師，1897 年起在中國傳教，

其後並擔任燕京大學副校長；亨利·魯斯自己就生於中國山東，長於中國山東，直到 1912 年離開中國），魯斯這位新聞事業資本家終其一生都將他對第二故鄉中國的熱愛灌注在他的刊物中。

這種熱愛同時也因為二十世紀中國「天翻地覆慨而慷」的革命洪流而顯得更為殷切。亨利·魯斯在世時，旗下的《時代》（*Time*）、《生活》（*Life*）與《財星》（*Fortune*）三周刊支持國民政府，尤其是蔣中正，始終不遺餘力。魯斯對於蔣中正的支持，至少出於以下幾點原因：一、魯斯和蔣中正擁有同一個宗教信仰，亦即基督教，魯斯盼望一個像蔣這樣的基督信徒，能成功導引他所摯愛的中國成為「美國世紀」工程的一個得力支柱，甚至進而成為一個基督教國度；二、作為一位共和黨員，魯斯的政治立場傾向於保守主義，絕對反共，並具有成分頗重的英雄史觀。

在亨利·魯斯及其雜誌群的包裝報導下，蔣中正被塑造成一個完美的政治人物。例如 *Time* 從 1928 年 10 月蔣中正出任國民政府主席後，就開始將蔣和美國的華盛頓畫上等號。1936 年全中國為蔣掀起盛大的五秩祝壽活動後，*Time* 將這位領導人稱為「寧波的拿破崙」—儘管雜誌似乎從未理解過這個問題：如何能將一個異國的政治人物，既喻之為合眾國的開國元勳華盛頓，又比附為稱帝的將軍拿破崙？

另一方面，蔣中正在國民黨中國的權力上升之際，非惟注意國際宣傳的重要性，甚且已知直指核心，視美國為宣傳重點。1932 年 11 月 9 日日記稱：「世界各國外交政策有正義而不變者，惟美國而已，美國政府尤以民眾輿論為依歸，余必從事喚起美國民心，以為我中國最友愛之友邦也。」所謂「喚起美國民心」，依日後與美國新聞媒體實際互動經驗看來，尤以與亨利·魯斯的報刊集團最為融洽周密。在國民黨統治中國時期，亨利·魯斯兩度重返中國，並成為蔣中正、宋美齡、宋子文等人的座上賓；國府遷至臺灣之後，魯斯和他的事業幹部仍多次訪問臺灣，並對蔣中正的反共事業繼續投注支持的立場。

Time 問世以來，沿襲至今的「封面人物」制度儼然已經成為這份雜誌的特色。根據雜誌編輯部的設想，藉由突出性的個人，乃是認識歷史力量的最佳途徑，而逐期由編輯部選出的封面人物。在某種意義上，被認為可以統領一個星期（或至少是近期）來的國際、美國重大事件。1924 年的吳佩孚是首位登上封面的中國人物。在這塊形象戰場上，蔣中正出現過十次：從 1927 年的北伐，至 1955 年的第一次臺海危機。截至今日為止，這十次上榜高居華人封面人物之冠，領先居次的鄧小平（7 次）、毛澤東（6 次），也許在可預見的未來，仍是不容易打破的紀錄。我們將這十次的封面和相關篇名臚列於下，並摘錄若干語句，大致上可以看出 *Time* 論述蔣中正的態度梗概：

1



Time Cover : Chiang Kai-shek , Apr. 4, 1927

時代背景：北伐進至上海（清黨前）

相關篇名：

Foreign News : CONQUEROR

Foreign News : Shanghai

語句摘錄：他雖瘦長，卻是果斷指揮南方軍隊的人，他就是征服了半個中國的偉大征服者、國民黨戰爭的支配者蔣中正。……蔣表現出一個征服者統領一切的氣勢，而不是和布爾什維克過於親密的同志。他謹慎運用各種方式（包括布爾什維克主義）來實現其目標，只要它適合於「中國人的中國」口號。

2



Time Cover : Chiang Kai-shek & Mme. Chiang , Oct. 26, 19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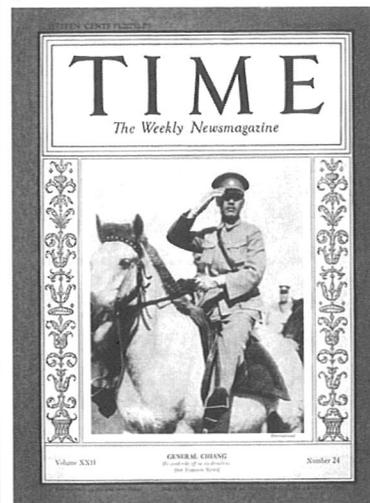
時代背景：九一八事變後

相關篇名：

JAPAN-CHINA : Boycott, Bloodshed & Puppetry

語句摘錄：黃埔是中國的西點軍校，學生赫赫有名，頗受曾任校長的蔣主席器重，黃埔教官是今日中國軍隊的主幹。蔣主席兩週前威脅說要向日本宣戰。上週，他保持沉默，緊張地與北方軍閥急電聯絡。

3



Time Cover : Chiang Kai-shek , Dec. 11, 19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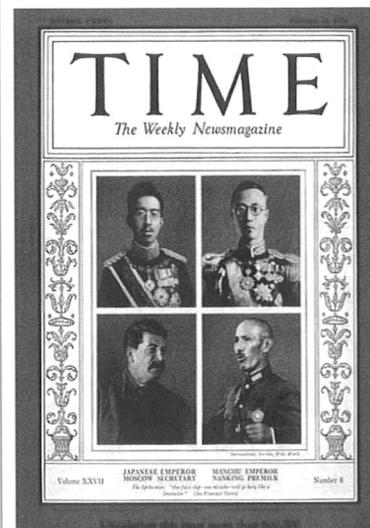
時代背景：安內攘外

相關篇名：

CHINA : CHINA Generalissimo's Last Straw

語句摘錄：一位了不起的戰士，堅定地騎著一批矮壯的中國馬，看著世界上這個人口最多，內戰頻仍的國家，他就是蔣中正委員長。這位曾經征服過中國的人，目前正面臨從廣州到北平之間的一場廣泛的內戰，儘管六個主要叛亂地區並不讓人太驚恐。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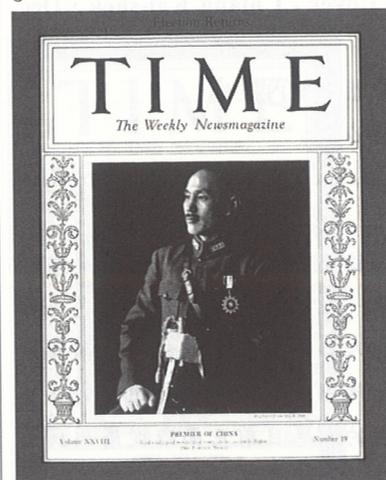
Time Cover : Hirohito, Pu Yi, Stalin & Chiang , Feb. 24, 1936

時代背景：安內攘外

相關篇名：

EASTERN ASIA : Soviets v. Empires
語句摘錄：幾年以來，蔣委員長一直努力避免與日本或別的外國敵人對抗，而繼續派遣大批軍隊去各地與中共作戰。他取得了許多勝利，他的屠刀讓數以千計的赤色分子人頭落地。上週，大城貴陽擊潰了強悍的共黨蕭克將軍和賀龍將軍的進攻。

5



Time Cover : Chiang Kai-shek , Nov. 9, 19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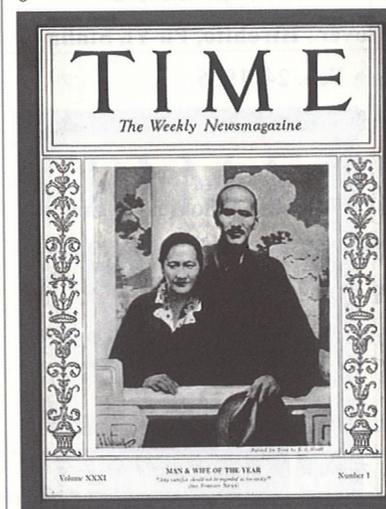
時代背景：安內攘外（蔣五秩壽辰）

相關篇名：

CHINA : Chiang Dares

語句摘錄：蔣中正的臉被日本人擱賞得紅透，但他的頭腦和意志已率領中國人取得非凡的成就。……在強有力的支持背景下，院長的五秩壽辰達到他生平的高峰。

6



Time Cover : General & Mme. Chiang, Couple of the Year , Jan. 3, 19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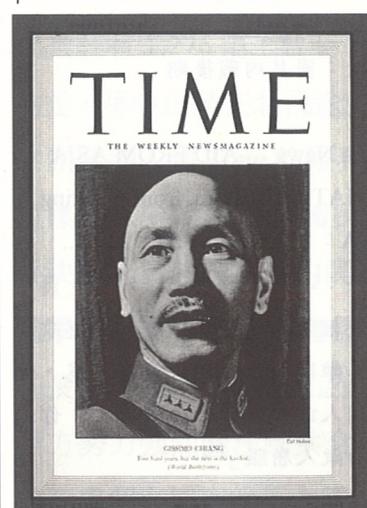
時代背景：抗戰初期

相關篇名：

INTERNATIONAL : Man & Wife of the Year

語句摘錄：蔣委員長伉儷一直不承認中國已戰敗，他們早就宣布，只要需要，他們將持久作戰，用游擊拖垮消耗，最終擊敗日本。如果蔣委員長真的贏得戰爭，他將成為本世紀的亞洲巨人。……本週，一位合眾社記者「在長江流域某地」同蔣宋夫婦在一起，他引用年度先生的話：「請告訴美國，充分信任我們，戰局已經起變化，勝利最終屬於我們！」

7



Time Cover : Chiang Kai-shek , Jun. 1, 1942

時代背景：抗戰中期（與二次大戰合流）

相關篇名：
World Battlefronts : BATTLE OF CHINA: The Incident Becomes a Crisis

語句摘錄：蔣中正委員長派來的中國軍事代表團團長熊式輝將軍特別向新聞界指出，盟國「除非有一個涵蓋所有鬥爭舞臺的聯合戰略」，否則不可能獲勝。沒有人注意到這一暗示。……東方已經來了，西方卻忙得顧不上過問。

8



Time Cover : Chiang Kai-shek , Sep. 3, 1945

時代背景：抗戰勝利

相關篇名：

CHINA : I Am Very Optimistic

THE NATIONS : Light in the East

語句摘錄：中國最終迎來了勝利，戰爭與外交兩方面的凱旋。前景仍未確定，但擁有四億五千萬人口的這一偉大民族，還從沒有如此接近和平與發展的時期。在經歷一個世紀的外國入侵和西方帝國主義干涉之後，中國成了自己國家和她命運的主人。……如今，蔣的堅定和策略終於證明是對的。在這場戰爭結束時，一個巨大的事實十分清楚，委員長已經證明他的政府得到普遍的支持，如果獲得和平，它能在中國建立起有效的管理。

9



Time Cover : Chiang Kai-shek , Dec. 6, 1948

時代背景：國共內戰後期

相關篇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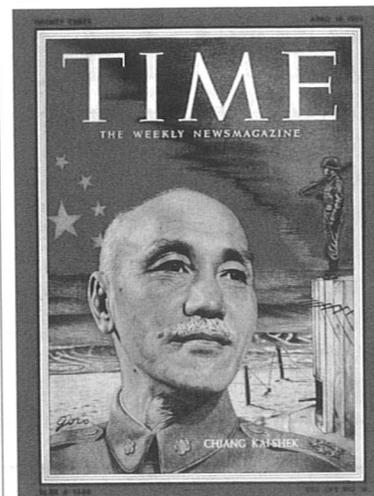
Foreign News : AID FROM ASIA

THE NATION : Lady from Nanking

CHINA : You Shall Never Yield...

語句摘錄：在層累的災難漩渦中，蔣中正委員長輕盈而又堅定。……問起政府是否打算離開南京，蔣說沒有考慮。他召喚中國人記起孫中山的遺言：「你永遠不能向敵人屈服」。

10



Time Cover : Chiang Kai-shek , Apr. 18, 1955

時代背景：第一次臺海危機

相關篇名：

FORMOSA : Man of the Single Truth

Publisher's Letter, Apr. 18, 1955

語句摘錄：1927年的封面人物首次描述蔣是位嚴肅而又年輕的國府領袖，且為孫中山的繼承人。他今天的目標和那時是一樣的：統一全中國。

根據我們的統計，“Chiang Kai-shek”一詞出現在 *Time* 上的篇數計有 1,276 篇（截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止）。超乎我們認知的是，蔣中正在北伐途中，亦即國民革命軍進向武漢的時候，才開始進入到 *Time* 的視界（本章後面即將提到的報刊其實也是這樣的）。1927 年，國民革命軍進向上海、底定長江流域、國共決裂，以及國民黨內鬨的這年，蔣中正的能見度在雜誌上明顯攀升【圖 3-1-1】，這個報導趨勢也說明了西方列強長久以來在長江流域（自武漢到上海）的利益和關懷所在。尤其是上海，西方勢力強烈關注國共合作下帶有「赤」色彩的北伐軍所可能帶給這個大城市的巨大衝擊。不過 *Time* 很快就發現國民黨複雜的政治內幕所透露的特殊訊息，他們察覺蔣中正表現出一個征服者統領一切的氣勢，但卻不是一個「和布爾什維克過於親密的同志」（1927 年 4 月 4 日）。其後的清黨事件證明了這一點，這不啻讓身兼傳教士之子與新聞事業資本家雙重身分的亨利·魯斯有了某種如釋重負的感覺。從 1927 年開始，蔣中正的前半生經歷開始被 *Time* 補行報導，這裡面有時候帶有說書人戲劇性的渲染效果，有時候則錯置歷史，將不同時間發生的事情拼湊到了一起。總之，如果說西方世界是在中共「二萬五千里長征」之後，才開始透過新聞記者的一手報導認識了毛澤東，那麼說西方讀者在北伐進向長江中下游之際，才在新聞界的引領下開始認識蔣中正也不為過。

從圖 3-1-1 可以發現，蔣中正在中日戰爭和國共內戰期間，獲得 *Time* 更多的報導。作為 1937 年 *Time* 的年度人物（蔣氏夫婦），蔣中正被雜誌評為團結了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雜誌強調中國在這位「卓越的」、「最有才幹的」領袖和其妻子的領導下，讓長期分裂的中國逐漸具備了民族意識。*Time* 注意到蔣中正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戰略，也願意承認日本終究不是美國，如果戰爭長期為繼，將使日本的經濟崩潰。「如果蔣真的贏得戰爭」，雜誌預言：「他將成為本世紀的亞洲巨人。」（1938 年 1 月 3 日）當太平洋戰事爆發，中國的抗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合流，亨利·魯斯透過他所主導的雜誌，加強塑造蔣中正在美國盟友面前的堅定形象。1942 年，*Time* 甚至採用偶像崇拜的手法評價：偉大的蔣，在士兵心目中，坐如山，動如龍，虎步昂行（1942 年 6 月 1 日）。

在亨利·魯斯將蔣中正塑造為英雄人物的戰時，1945 年的報導量達到最高點的現象頗能見證蔣一生志業的頂峰確實就在此時。另一方面，戰時和戰後，蔣頻頻出現在 *Time* 的現象也充分說明了這時美國積極介入中國政治，並就某種程度而言成了一個「局內人」的角色。毫無疑問，對於中國問題，亨利·魯斯自己也是一個局內人。根據魯斯「美國世紀」的理念，美國應該認識到自己的福祉和全世界的自由休戚相關，進而果決地掌握「創造性的機遇」，充當世界領袖，把美國的民主原則輸

出到全世界。職是之故，魯斯呼籲美國應積極參與二次大戰，並充分意識到中國應在「美國世紀」當中占有一席之地。本於這個理念，亨利·魯斯除了以旗下刊物大幅報導中國和蔣中正外，並且親力親為，在中國的民族戰爭和接續的國共內戰年代當中，積極奔走，聯繫美國朝野以實際行動援助中國和蔣中正。抗戰期間，魯斯以 *Time* 為核心，結合美國知名人士成立美國援華聯合會（United China Relief）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抗戰後期，亨利·魯斯極力把蔣中正塑造為重建中國的英雄，這讓他與該雜誌駐中國記者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之間產生了觀點上的衝突。戰時，白修德逐漸意識到國民黨政權包括人謀不臧在內的種種負面表現，並且認為中國共產黨不容小覷，亦非一個盲目追隨史達林的共產黨。這樣一來，白修德和另一位記者賈安娜（Annalee Jacoby）的文章幾乎完全被魯斯新任命的編輯修改得面目全非，白修德就蔣中正和毛澤東各自意味著什麼以及他們所扮演的角色和魯斯爭吵，最後因而分道揚鑣。

當中國對日抗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同步結束之際，*Time* 第八次將蔣中正放上了雜誌的封面，並從中國發出報導：「在這場戰爭結束時，一個巨大的事實十分清楚，委員長已經證明他的政府得到普遍的支持，如果獲得和平，它能在中國建立起有效的管理。」（1945 年 9 月 3 日）事實上，這完全不是原始報

導人的手筆，它大幅修改過了，轉而符合亨利·魯斯個人立場的評斷。事實上，戰後中國並未朝著魯斯的預言前進。這時，儘管 *Time* 持續報導中國的世變和國民黨政權的紛亂局面，但仍舊突出了蔣中正令人印象深刻的毅力和強烈的使命感。1948 年底，國共關鍵的三大戰役勝負幾乎已見，南京已成危卵之勢。第九次躍上 *Time* 封面的蔣中正被描寫為「輕盈而又堅定」，儘管 *Time* 也注意到蔣的威望在大城市裡「已比長江的水位還低」。 *Time* 以大篇幅文字回顧了二十多年來蔣中正與中共的恩怨歷史，包括蔣經常被人們傳述的一句名言：「日本就像是可怕的皮膚病，但共產主義是癌症。」這篇冠以「你永遠不會屈服」篇名的報導指出，蔣中正從不認為中國的共產黨和別的共產黨有什麼不同，畢竟他認識他們太久了（1948 年 12 月 6 日）。

1949 年後，亨利·魯斯仍然堅定支持遷抵臺灣的蔣中正政府，既不承認共產主義能以一種政權的形式存在，也不承認它是改變中國的歷史力量，他始終對蔣中正投注希望。及至韓戰爆發後，臺海問題除了先前國共內戰的舊遺緒、舊脈絡之外，開始更添上了國際冷戰的新格局，以致愈為糾結難解。1955 年初的第一次臺海危機使得臺灣博得了國際視聽，在 4 月份，蔣中正第十次（也是最後一次）成為 *Time* 的封面人物。雜誌再次大幅回溯了蔣建設中國與臺灣的成就、與共黨之間的長期糾葛，以及對於基督信仰的真誠。報導人強調蔣中正的個人特質，

將之形容為信奉單一真理的人，報導也注意到蔣在臺灣的強人統治，認為他的權力主要是建立在人們對其激勵與命令的敬畏。報導人也引述蔣中正的說法：他的反攻宏業絕對不會導致一場大的總體戰爭（如人們所畏懼、力避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相反的，如果中國繼續掌握在共產黨的手上，那麼一場「三分之一的世界大戰」倒是有可能發生的（1955 年 4 月 18 日）。

1955 年是中華民國政府遷至臺灣以後迄今，*Time* 報導蔣中正最頻繁的年份。換言之，爾後隨著冷戰「低盪」（*Détente*）形勢的到來，臺灣在國際政治上日益邊緣化，蔣中正在雜誌上的能見度也愈來愈小了【圖 3-1-1】。1975 年，*Time* 將蔣中正逝世和中南半島陷落的兩件重大新聞聯繫起來，指出：對蔣中正而言，後者幾乎是在亞洲輸掉反共鬥爭的必然續集，而蔣早就是首要的受害者。報導人指出蔣中正做為一個革命的、赤忱的民族主義者，其史詩般的生涯兼具勝利和悲劇色彩：從反滿、反軍閥、抗日，直到共產黨趕走了他支配中國的夢想。*Time* 也評論蔣中正投射給二十世紀的身影尤其長過給中國的：雜誌回顧了蔣中正在二戰時的盟國四巨頭（*Big Four*）地位，以及戰後杜魯門政府一度放棄蔣中正的中國乃至 1972 年尼克森訪問共黨中國的歷史。

1970 年代，亨利·魯斯早已逝世，美國開始聯中（共）制蘇，國際「低盪」新形勢重新修正了冷戰早期簡單二元對立的

決然思維（事實上，也重新修正了 *Time* 自己），這時 *Time* 筆下的蔣中正也不再是以往那個單面的英雄性格人物了。在蔣中正逝世後出刊的這一期 *Time* 嘗試給蔣「蓋棺定論」，但細心的讀者當能發現，它的定論全然並非建立在這本雜誌之於亨利·魯斯那個老年代的報導立場上，恰恰相反，它似乎是走到了日後學者艾愷（Guy Alitto）所批評的西方史學論著那股對蔣中正不盡友善的敘事傳統上。*Time* 拆解一個冷戰初期的老問題，並指出：中國從未真的輸掉、丟掉，也沒有勝利過，「蔣中正主政下的中國，既受困於外在侵略、極深的內部分裂、國民黨的腐敗無能，甚至還有蔣頑強堅持其短視的、無效的政策。」*Time* 評論：蔣中正從未完全擺脫堵在根本改革道路上的軍閥和封建地主，他也無法打造一個經久的政治制度；基本上，蔣中正和國民黨未能解決中國的基本問題：農村貧困、文盲、不公正的稅收、高利貸和過高的地租，他主張的革命是保守的。至於毛澤東的革命反是，他承諾土地改革，也要打翻舊體制，他「吸引了更多數的人」（1975年4月14日）。



圖 3-1-1：Time 歷年報導蔣中正篇數統計圖（1975年止） 單位：篇

二、生活雜誌 *Life* 與 *Life photo archive*

Life 這本雜誌在 1883 年創刊時的旨趣，與日後亨利·魯斯時代的 *Life* 不同，它當時走的是幽默和市井興趣的路子。1936 年，*Time* 發行人亨利·魯斯買下這本雜誌後，將之改頭換面，定位為攝影報導（photojournalism）的專業刊物，旨在呈現美國觀點的社會風貌。其後，這本雜誌與 *Time* 聯手，開啓了亨利·魯斯（或者說，這兩本刊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的影響力。

1936 年以後，*Life* 標榜 “To see life ; see the world” 的編輯宗旨，即「看見生活，看見世界」。在「看見」的思維下，亨利·魯斯深信照片可以完善的自成一個故事，而不是僅僅爲了說明文字，做爲附庸。由於亨利·魯斯的親華思維，這份刊物當然也注意到了「東方」，「看見」了中國。1938 年 5 月，*Life* 封面以一位中國士兵（A Defender of China）爲主角，採取由下而上仰拍而得的巍峨頭像，連同內頁來自中國圖文並茂的戰爭報導，具體展示了中國軍民頑強抵禦日本侵略的史詩般情節，即是令人津津樂道的例子。【圖 3-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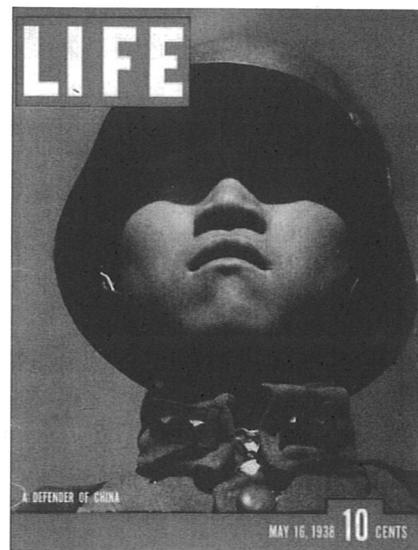


圖 3-2-1：A Defender of China, *Life*, May 16, 1938

Life 當然也「看見了」蔣中正，尤其是透過攝影圖片的方式（它也看見了宋美齡，特別在 1941 年 6 月，宋美齡還上了 *Life* 封面【圖 3-2-2】）。但無論是中國或是蔣，我們必須理解：首先，這是一本「美國人的」雜誌；其次，這是一本「亨利·魯斯的」雜誌。也就是說，當我們凝視蔣中正在 *Life*（以及 *Life photo archive*）的形象時，其實是一種疊影，一種異時代、異地域的讀者、照片創作者、報業老闆之間的意識絞合過程。無論如何，這些照片的價值仍是無與倫比的，其首要的意義在於 *Life* 在發行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有助於亨利·魯斯向更多的美國人、更具象化的介紹這位東方領袖及其國家之命運。可以說，蔣中

正的形象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透過這本雜誌進入美國人民眼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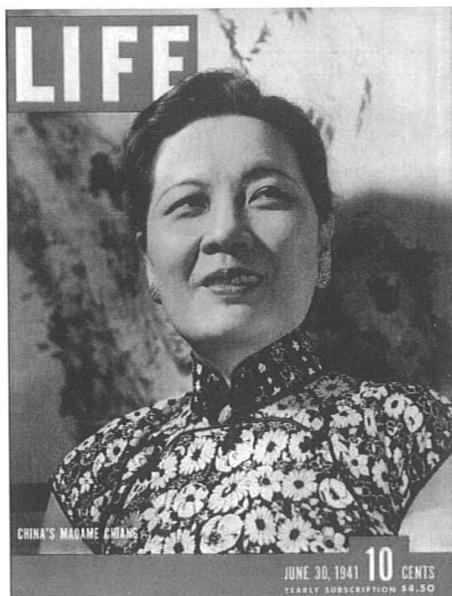


圖 3-2-2：China's Madame Chiang, Life, June 30, 1941

從 1941 年到 1961 年，亨利·魯斯的 *Life* 既關注蔣中正夫婦做為中國領導人在公領域的身影，也企圖捕捉他們私領域的行跡。在公領域方面，我們可以看到蔣在各時期的戎裝照、辦公照、會議照（重慶會談、政協會議、國民黨中央全會、陽明山會談……等），抗戰後期宋美齡令人注目、由亨利·魯斯牽線促成的訪美之行，以及蔣中正與各方要人的合影。這些合影除了中國的一些軍政人物之外，當然也包括那些與中國之命運

緊密交疊的美國軍政人物，他們至少包括：

- | | |
|----------------------------|---------------------------------------|
| 陳納德 (Claire L. Chennault) | 拉鐵摩爾 (Owen Lattimore) |
| 赫爾利 (Patrick Hurley) | 毛澤東 |
| 馬歇爾 (George C. Marshall) | 傅作義【圖 3-2-3】 |
| 衛立煌【圖 3-2-3】 | 宋子文 |
| 杜聿明【圖 3-2-4】 | 司徒雷登 (John Leighton Stuart)【圖 3-2-5】 |
| 李宗仁 | 霍夫曼 (Paul G. Hoffman)【圖 3-2-5，3-2-12】 |
| 杜勒斯 (John Foster Dulles) | 葉公超 |
| 艾森豪 (Dwight D. Eisenhower) | 費爾德 (Harry D. Felt)……等 |



圖 3-2-3：1948 年 左起：傅作義、蔣中正、衛立煌



圖 3-2-4：1948 年 左起：蔣中正、杜聿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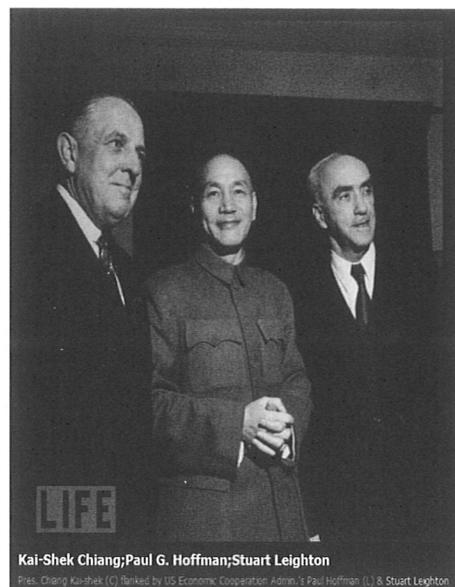


圖 3-2-5：1948 年 左起：霍夫曼、蔣中正、司徒雷登

在 *Life photo archive* 利用“Chiang Kai-shek”搜尋所找到的 218 個結果中，蔣中正並不只有嚴肅、剛正的表情。其實大多時候，透過 *Life* 的鏡頭，他給人一種閒適、慈悅，甚至靦腆的印象。【圖 3-2-6，3-2-7】在私領域方面，我們可以看到蔣氏夫婦的家居合照、獨照與家族合影，時空跨越戰時重慶到海島臺灣的官邸庭園、客廳與餐廳——顯然，這是蔣中正給予 *Life* 的一種特許，也是對於親華、友蔣的亨利·魯斯的一種盛情回饋【圖 3-2-8，3-2-9，3-2-10】。1941 年，在蔣中正官邸留下的一幅單人戎裝照，則讓人驚嘆於世界知名攝影記者 Margaret

Bourke-White 富於支配、定位的能力。當然，更讓人訝異於蔣的配合度之高。人們看過太多的蔣中正官方照片，也習以為常了，但這張照片的拍攝角度令人感到陌生，它特別突出了一個焦點，即蔣中正著意昂起的下巴，它也許可以被理解為自尊、毅力、決心的表徵【圖 3-2-11】。我們也看到蔣中正上教堂做禮拜的鏡頭，尤其是畫面來自於國共內戰面臨決戰當下的 1948 年 12 月：「勝利」堂，那給人一種蔣試圖從基督信仰中抉發無窮力量的聯想【圖 3-2-12】。另外，在不少照片中，我們甚至看到蔣中正對國民黨中國與臺灣的被治者而言，完全陌生的體態（肢體動作）展現——這些照片可能有礙於領袖神話的塑造（對於國民黨中國與臺灣的內部邏輯而言，這些體態動作不夠堅定、明確，同時也缺乏高度的感召力）。但毫無疑問，它們有助於一位政治強人友善、親和形象的塑造，更重要的是，有助於這個形象朝向西方讀者的浸透【圖 3-2-13，3-2-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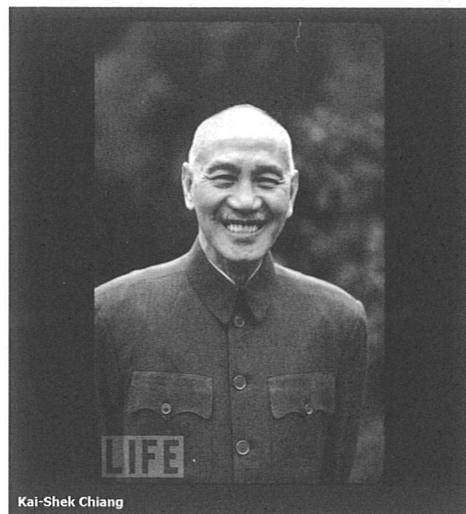


圖 3-2-6：1957 年 蔣中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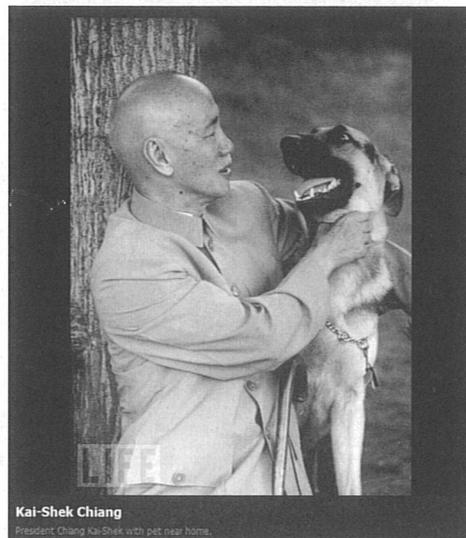


圖 3-2-7：1961 年 蔣中正



圖 3-2-8：1941 年 左起：宋美齡、蔣中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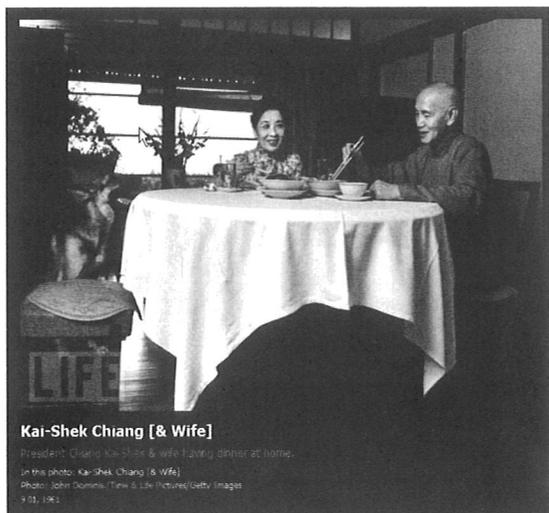


圖 3-2-9：1961 年 左起：宋美齡、蔣中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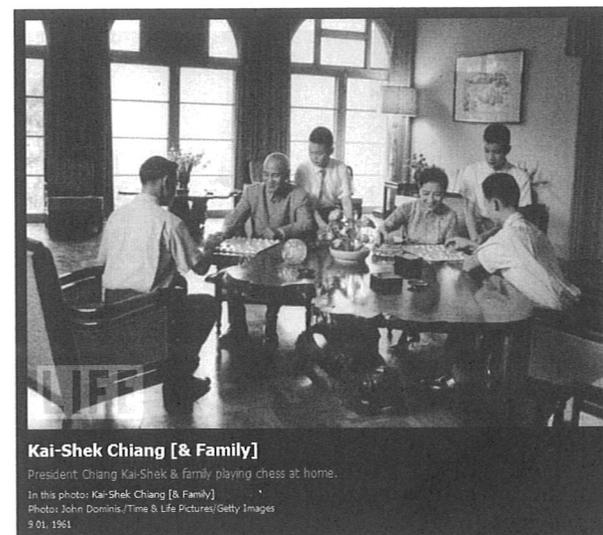


圖 3-2-10：1961 年 蔣中正家族



圖 3-2-11：1941 年 蔣中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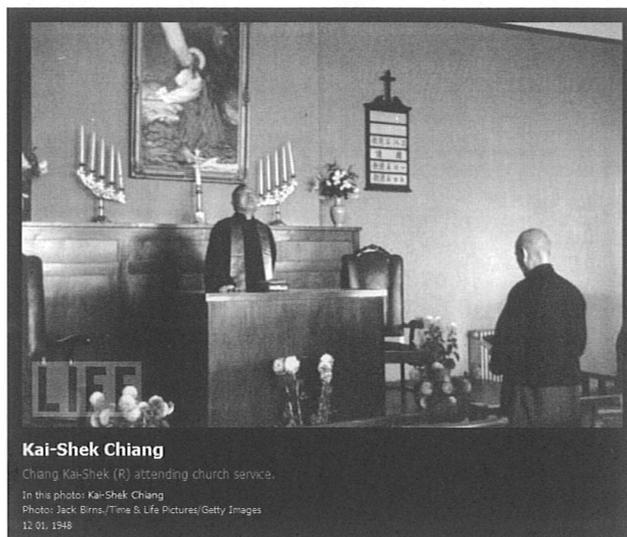


圖 3-2-12：1948 年 蔣中正



圖 3-2-13：1948 年 左起：霍夫曼、蔣中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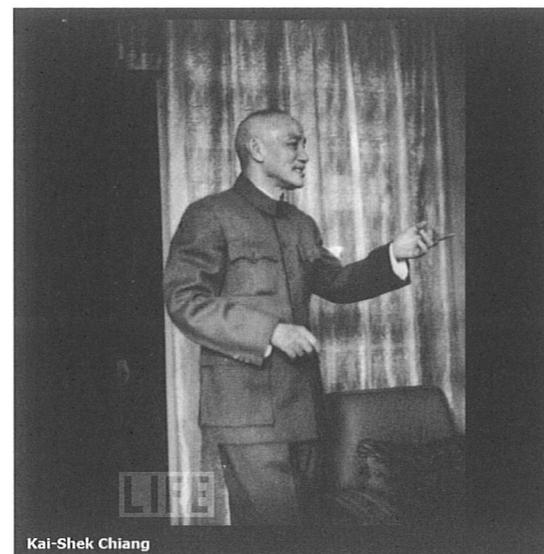


圖 3-2-14：1955 年 蔣中正

在本質上，*Life* 的鏡頭呈現的是美國中心的視野，經常流露出明顯的美國或西方價值觀。例如 1941 年蔣中正夫婦在重慶一幅家居照的前景：西方款式的厚實布製沙發，西方種的大犬，毛織地毯，典型的西方生活品味——儘管這些並不是畫面的全部。攝影者控制了畫面的疆界，從而誘導讀者（美國讀者）在疆界內（畫面內）感到熟悉自在，彷彿畫面裡的異國主角與之分享的是共同的理念和生活價值。在中國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這時，美國讀者或許也會注意到，照片後方的飾物櫃上置放的是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相片，這似乎證明蔣中正夫婦擁有一些小心思，他們懂得自己所面對的，是

一家純正的美國人媒體，正如同史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討論「圖像證史」之為用時所強調的：「在肖像畫中，人們身旁放置的附屬物品強化了他們自我表達。」【圖 3-2-15】又如 1946 年在南京一張官邸照片裡的唯二主角：餐櫃裡多不勝數的西洋茶杯組，壁上則是宅第男主人（蔣）的肖像掛照，一派西方風尚。【圖 3-2-16】又例如 1945 年重慶會談，美國大使赫爾利與蔣中正、毛澤東的合影，【圖 3-2-17】以及 1955、1958 年杜勒斯與蔣中正的會面，都足以說明美國在國共關係上所持續扮演的積極角色。【圖 3-2-18，3-2-19】



圖 3-2-15：1941 年 左起：蔣中正、宋美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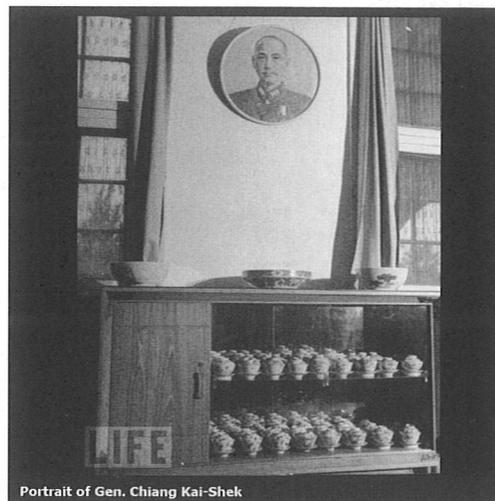


圖 3-2-16：1946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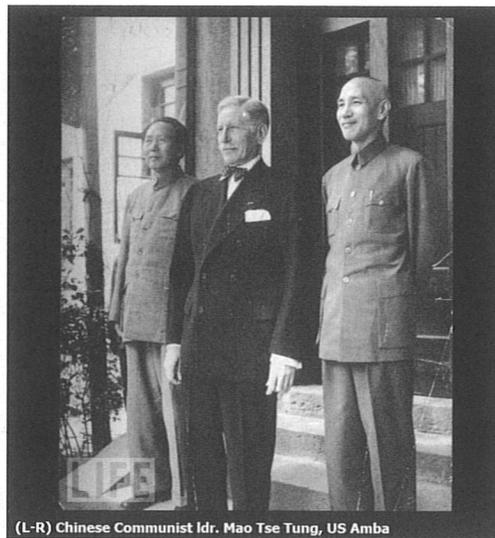


圖 3-2-17：1945 年 左起：毛澤東、赫爾利、蔣中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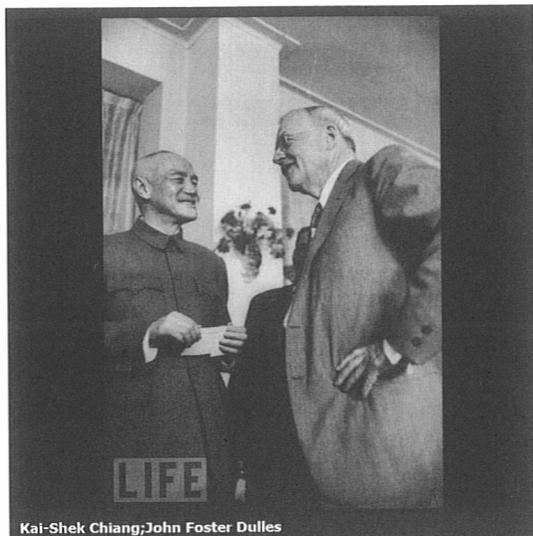


圖 3-2-18：1955 年 左起：蔣中正、杜勒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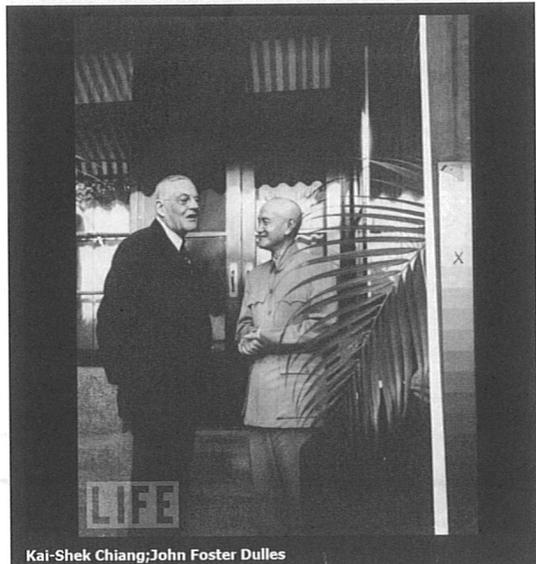


圖 3-2-19：1958 年 左起：杜勒斯、蔣中正

三、紐約時報 (*The New York Times*)

The New York Times 於 1851 年創刊（當然，和英國的 *The Times* 一樣，他們最早的報名都不是這個令後人熟悉的名字）之後，一直標榜純正、議論平和的路線。十九世紀末，阿道夫·奧克斯（Adolph Ochs）接辦《紐約時報》後，尤其銳意革新，增刊擴版，大量增加當時頗為稀有的國際新聞內容，從而提高了報社的國際聲譽。相對於西方小報爭取普羅讀者所採的娛樂羶色腥取向，美國的 *The New York Times* 通常被視為這個國家的質報代表。這家歷史久遠的報紙主要爭取的是知識菁英的視線，理所當然的也被視為西方世界的輿論重鎮。直到今天，許多人仍然認為這份報紙的立場較為接近自由派，特別是和同個城市另一個可敬的競爭對手《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所擁有的保守主義風格比較，自由主義風格尤其是明顯。

截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The New York Times* 歷年報導蔣中正計有 11,736 筆資料，英國 *The Times* 歷年報導蔣中正計有 3,770 筆資料（以“Chiang Kai-shek”進行語句搜尋，以每則為單位），兩份報紙的報導數量有著懸殊差異。從某種角度而言，這個現象也顯示出美國、英國這兩個國家涉入（蔣中正的）中國政治的深淺程度。回到初始，在中國，上海是最能牽動外國勢力視聽與神經的地方，關於這一點，無論是英國人或是美國人的觀

點並無不同。而蔣中正所領導的北伐，在早期，亦即國共合作的背景下，直接挑戰了所謂帝國主義的既得利益。例如《紐約時報》最早的 Chiang Kai-shek 出現在 1926 年，報方在 10 月 19 日的報導中說明了「廣東軍隊」（Cantonese troops）繼續指向上海的事實，並寄予關心。這種高度緊繃的心理，使得接著一個禮拜內「廣東軍隊的領袖」蔣中正在南昌軍次先是負傷，繼是死亡的傳聞躍上了素以嚴謹著稱的《紐約時報》版面，而這仍不過是蔣的名字第二次和第三次出現在這份西方報紙的讀者面前而已。

就總體所呈現的輪廓看來，基本上，根據 *The New York Times* 報方流露的自由主義傾向，其對於蔣中正的報導與評述，並不盡如亨利·魯斯的雜誌帝國那樣友善。例如 1926 年，*The New York Times* 尙憂慮蔣中正這位「新強人」（New strong man）未來會是個「上海強盜」（Shanghai robber），在這時，《紐約時報》已將“the Cantonese dictator”的封號送給了蔣（直到今天，《紐約時報》對於蔣的報導和評論，有 2.8% 的則數提到了 dictator 這個詞彙）。不過讀者也必須理解，國民黨北伐統一中國之後，蔣中正當然也注意國際宣傳的重要性，手段或疾或徐，或剛或柔，不一而足。1934 年，*The New York Times* 駐華首席記者哈雷特·阿班（Hallett E. Abend）報導剿匪軍事，被蔣與國民政府認為謬誤，原本已取消阿班的拍電權，並欲勒令出境，終以外交部訓

令駐紐約總領事向《紐約時報》交涉，得登文道歉了結。而長期看來，阿班身處國民黨中國，直到上海孤島的最後一刻離華，基本上仍然能夠同蔣中正、宋美齡以及國民黨要員（如宋子文）保持長久良好的交情。1936 年 12 月，阿班即透過國府顧問端納（William H. Donald）、宋子文的管道，首先向西方世界發出西安事變的獨家報導，《紐約時報》並評論蔣中正在這些年達成了非凡的國家統一，但張學良的最後通牒很可能要推遲了國家的復興。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美兩國利益愈見交錯，美國在某種程度上成爲中國境內政治的參與者。這時國共漸趨殊途，民主化問題躍爲口舌交鋒重點，執政的國民黨政權形象大失。1942 至 1943 年間宋美齡的訪美之行，曾經掀起美國朝野（包括 *Time*、*The New York Times* 等主流報刊）的中國熱與宋美齡旋風，蔣中正及其國民黨政權同受其惠。但是，這等於也是國民黨政權的聲望在美國的頂點了。此後不僅再難企及，甚至每下愈況。1944 年 2 月 19 日《蔣中正日記》：「最近共黨對美國宣傳鼓勵干涉我國內政，要求我政府准美國派視察團到延安，實地調查真象。此次共黨政治攻勢，國內外互相聯絡，可謂最大最猛之一擊，非毅然拒絕並乘機予以反擊，決不能平息此風潮，貽患且將無窮也。」2 月 26 日：「中共在美宣傳稱我軍已不打日敵而集中力量將攻中共，……可慮者，美國朝野已爲其宣傳

所惑，信以為真矣。」究其實際，其後視察團之行果然成真，所謂「不打日敵」之說則是繼續發酵。這年稍後，包括 *The New York Times* 在內的中外記者團延安之行，看到了一個迥異於國民黨中國的世界。他們對於中共抗日根據地的美化報導，塑造了西方世界此後一段時期對於中共基本認識的調子：延安很可能代表的是一個未來的新中國，毛的奮鬥不見得為的是蘇聯共產黨的世界革命事業，相反的，倒像是林肯解放黑奴的那場事業。*The New York Times* 希望看到一個統一的中國，不論是為美國自己，或是中國。《紐時》認為如果蔣中正的政府能在各方面開放，而中共願意在廣受人民支持的政治民主、土地改革的程序裡走去，國共攜手下的中國前景將是光明的。

這時，即使連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也主張援助中共軍隊，俾讓中國扮演一個更積極的盟國角色。但連同這一點看起來，其實他和蔣中正之間在各方面都已再難調和，終致去職離華。一般認為「史迪威事件」對戰時中美軍事同盟關係產生了極為不良的影響，不過事實上，透過美國報界的連篇報導，事件本身恐怕更是讓蔣中正和國民黨政權在美國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分數急劇跌落。1944年10月31日，*The New York Times* 以頭版、獨家、大幅報導史迪威離華內幕，記者愛金生（Brooks Atkinson）描述蔣中正和史迪威的決裂「起因於蔣拒絕全力作戰」，並指出：美方同意蔣中正的撤史提議，意味著美國默認

「一個垂死的反民主政權的勝利」。愛金生的報導掀起震波效應，美國各家報紙紛紛跟進，蔣中正則憤指愛金生、《紐時》「污辱已極」，「美國輿論更不待言矣」，11月4日日記：「史迪威回美以後，其反宣傳不僅詆毀我個人，且必推倒我政府，其各種誣蔑詆毀，以《紐約時報》愛金生之專論為代表，可謂污辱已極，而共匪乘機煽動，美國輿論更不待言矣。惟余寸衷泰然，不為其所動，蓋此早為預料所及也。」

同年，在這稍前，*The New York Times* 經常介紹孫科在大後方憲政運動的時機所高倡的一個民主化中國理念，形同將此時重慶的國民黨政爭延燒至外國土地。就某種程度而言，蔣中正贏了史迪威，卻輸掉了美國。在 *The New York Times* 等報紙的報導趨勢下，蔣中正和國民黨的形象恐怕不是亨利·魯斯的媒體帝國所能獨力撐持的。甚至戰後，關於1947年的臺灣，*The New York Times* 根據由臺灣返回中國南京的外國人士的說法發出報導，指稱臺灣人在二二八事變中被殺「萬人」，「看來有個政策打算殺掉最優秀的人們」。

這時在中國，《紐時》積極鼓吹的聯合政府願望早已破滅，報方對國共內戰時的國民黨方面並未寄予積極同情。1949年以後對臺灣，《紐時》陸續聲援雷震、彭明敏、黃文雄、鄭自財等異議分子，並對蔣中正的反攻願望斥為神話。1975年蔣中正逝世，《紐時》雖以巨幅報導，稱蔣為「二戰同盟國四巨頭的

最後一人」(Last of Allied Big Four of World War II)，但其社論卻也採取詭辯學派的技法，直指在動盪的中國底下，無比勇敢而堅毅的蔣「其實從未(真正)統治過中國」(Never in fact ruled China)。

以平均值來看，從 1937 年中日戰爭(和稍前)到 1958 年第二次臺海危機(八二三砲戰)之間，是 *The New York Times* 報導蔣中正的高峰時期；其後，該報對蔣投注的眼光大幅降低，除了 1971 年。【圖 3-3-1】。根據我們的比較研究發現，英國 *Times* 歷年報導量雖然遠遜於紐時，但它的報導量趨勢線，其高其低之走向，和 *The New York Times* 其實是非常相似的。准此，也許可以提出幾點值得人們繼續探究的現象：

- 一、兩份西方主流報紙對於蔣中正在 1927 年長江流域(尤其是以上海為代表的下游地帶)的行止／國民黨內部動盪之烈的興趣，明顯高於國民黨統一全國的 1928 年。這說明了西方勢力在長江流域享有高度特殊利益的事實，以及伴隨此利益所衍生的關注角度。
- 二、隨著 1935 年日本對華北的侵略加劇，國際秩序持續不穩的狀況下，兩份報紙對於蔣中正的報導開始增加。
- 三、抗戰期間、國共內戰期間，蔣中正頻受西方媒體報導，無論成敗，蔣做為世界級政治人物的地位已無庸置疑。
- 四、自 1950 年代的兩次臺海危機之後，西方主流媒體明顯流失

了關注蔣中正的積極意願，從某種角度講，局勢獲得穩定後的臺灣再也不是國際舞臺上的主要角色了，冷戰時期新釀成的「低盪」情勢尤其急速、劇烈的將臺灣邊緣化。在 1950 年代至 1960 年代初的臺灣，蔣中正既能多次接見款待 *Time* 的亨利·魯斯、發行人赫成爾與賈克遜、記者雷洛克與訪華團一行，也能多次接見款待 *The New York Times* 發行人沙茲伯格、總主筆毛瑞、主筆史密斯、軍事專欄作家鮑爾溫、臺灣特派員馬格瑞華與李博文。1960 年代中期以後，雖然蔣中正仍舊重視西方主流媒體的涉臺訊息(例如 1967 年 *The New York Times* 社論報導美國政府考慮促請蔣中正自金馬撤軍，蔣見報後甚至召請美國駐華大使馬康衛〔Walter P. McCaughy〕力闢撤軍之非)，但事實則是：西方主流媒體訪問臺灣面見層峰的紀錄的確為之遽減。接下來幾年，美國開始建構「聯中(共)制蘇」的思維並付諸行動，臺灣實則沒有過多的籌碼，以挽回不利的外交處境。1971 年，臺灣自美國尼克森總統方面與聯合國大會領受的雙重打擊，則是國際舞臺邊緣化的悲劇極致表現。在這些年，蔣中正又被西方主流媒體較多的提及了，但似乎也只是個「迴光」映現而已，直到 1975 年蔣的逝世【圖 3-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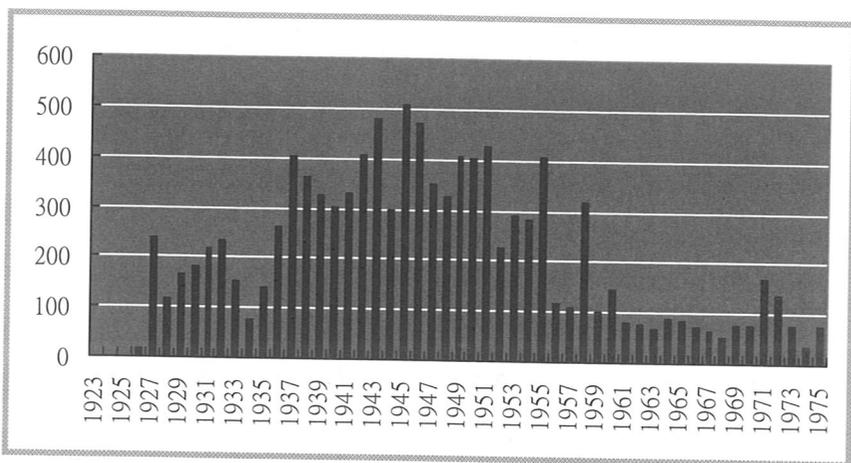


圖 3-3-1: *The New York Times* 歷年報導蔣中正則數統計圖 (1975 年止)
單位：則

資料來源：The New York Times Archive Search for 'Chiang Kai-shek',
<http://query.nytimes.com/search/query?srchst=p&query=chiang+kai-shek&bylquery=&hdlque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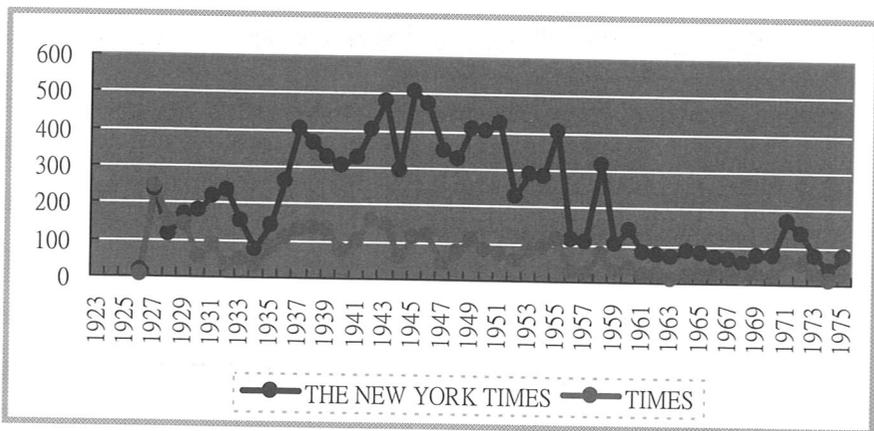


圖 3-3-2: *The New York Times* & *Times* 歷年報導蔣中正則數的比較圖 (1975 年止)

單位：則

四、結語

本章以《時代雜誌》(*Time*)、《生活雜誌》(*Life*)、《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等三種美國報刊為主要對象，考察其報導蔣中正所呈現的基本輪廓，以及其報導所可能呈現的史料意義。

首先，在報導的則數與頻率方面：我們發現，“Chiang Kai-shek”是在 1926 年國民革命軍進向長江中游時，才開始透過西方媒體的報導，進入到西方讀者的視界。這是因為國共合作下的北伐軍即將搗向西方在華勢力的利益重鎮，蔣做為這支軍隊的指揮者自然受到注意。及至 1927 年，基於同樣的邏輯，由於北伐軍進向長江下游（尤其是上海一地），以及隨後的清黨、國民黨內鬨，有關蔣中正的報導量呈現顯著成長。抗日戰爭則是蔣中正一生最受美國報刊關注的時期，這當然也說明了中國已逐漸在國際政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尤其是。隨著中國抗日戰爭與做為二次大戰同盟國的雙重勝利，蔣在 1945 年的 *Time* 和 *The New York Times* 的版面上，均達到報導量的絕對巔峰。戰後中國仍然動盪，最終將國共內戰的殘餘格局帶至 1949 年以後的臺灣海峽，爾後國際冷戰的形勢亦在臺海地區合流，進而導致 1955 年的第一次臺海危機、1958 年的第二次臺海危機。兩次臺海危機之後，冷戰時期逐漸釀成的「低盪」

新情勢正急速、劇烈的將臺灣從國際舞臺上給邊緣化，包括 *Time* 和 *The New York Times* 在內的美國主流媒體不再積極關注蔣中正。1971 年，美國總統尼克森宣布擇期訪問中國，稍後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這時蔣中正雖然又被西方媒體較多的提及，但這個「反常」現象正好是用來證明臺灣邊緣化的悲劇在這一年又更遭逢了極致的衝擊而已。考察上述的總體報導頻率，其實就是隨著西方國家自己的利益和國際秩序連動的走向而呈現消長的態勢【圖 3-4-1】。

第二，在報導者的描述與評價方面：不管是 *The New York Times* 或是 *Time*，在剛開始向美國讀者介紹蔣中正時，均帶著點傳奇的效果，這意味著蔣的崛起太速，西方媒體似乎是在資訊未盡充足的條件下對這位政治新強人進行生平的補述報導，或是引自北伐戰場上的道聽塗說。基本上，自蔣中正統一中國後，兩家美國報刊基於各自的思想立場對蔣中正做出了不盡相同的評述：*The New York Times* 基於自由主義的立場，對蔣不無批評之處；*Time* 基於保守主義和亨利·魯斯的個人立場，對蔣幾乎投以慷慨的支持。不過，兩家報刊的報導也不盡然涇渭分明，例如抗日戰爭伊始，兩家報刊就一致針對蔣中正領導的中國及其奮鬥事業寄予同情。在這樣的輿論形勢推動下，1942-1943 年由亨利·魯斯協助推動成局的宋美齡訪美之行當然更容易博取美國朝野的無限傾心。不過，正是這個時候開始，兩家報社

的記者也都注意到國民黨政權的政治衰微和人謀不臧的負面表現，*The New York Times* 充分報導出來了，並且還及於中共作為一個對照組的正面描述。*Time* 雖然也發表了記者對於國民黨政權的一些負面觀察和實地調查，但最後仍在亨利·魯斯的強力主導下，不惜刪削記者後續不利於蔣的文字（並直接在編輯臺上重寫之），期能力保蔣的形象。1949 年後，*The New York Times* 原則上秉持自由主義的立場，對於臺灣的民主迭有責言，對於蔣中正的反攻宏願斥為神話。*Time* 則是長期頌揚蔣中正反攻宏願所展示出來的驚人意志力。直到國際冷戰的「低盪」形勢降臨，重新修正了冷戰早期簡單二元對立的決然思維，像 *Time* 這樣擁蔣反共的鮮明立場，愈發的在主流言論市場上失去他們的立足點，何況亨利·魯斯也已在這時逝世了。明白了這點，我們才可能理解，為什麼在 1975 年蔣中正辭世的時候，*The New York Times* 和 *Time* 對這位逝者的評論，在大輪廓上竟沒有太多的差異。

第三，在報導所可能呈示的史料意義方面：關於這一點，我們要特別強調 *Life* 的角色。一般而言，文字的材料容易被研究者歸類、排比、理解，但是照片材料經常受到忽視，有關蔣中正的資料運用大致也存在這樣一個現象。目前國內檔案機構典藏蔣中正照片者以國史館、國民黨黨史館為大宗，*Life* 的檔案數量雖然遠不能及，但它畢竟獨立的提示了幾個深入研究的可能性：1. 蔣中正對於「膠卷形象」的重視及其操作過程；2. 蔣

的膠卷形象如何在西方讀者（而非中國人自己）面前生產出理性或感性層次的有效意義；3. 由親華、友蔣的媒體為蔣所拍攝的膠卷形象，和蔣自己的（勵志社、中央社、中央日報……等）攝影員的作品之間，在題材選擇、構圖取景、方位角度、意欲傳達的效果等方面，是否有所不同，如有不同，何以不同；4. 一張西方人拍的照片，如何透過一種異時代／異地域的讀者、照片創作者、報老闆之間的意識絞合過程，脫胎出它當下的（而非僅是歷史上的）獨特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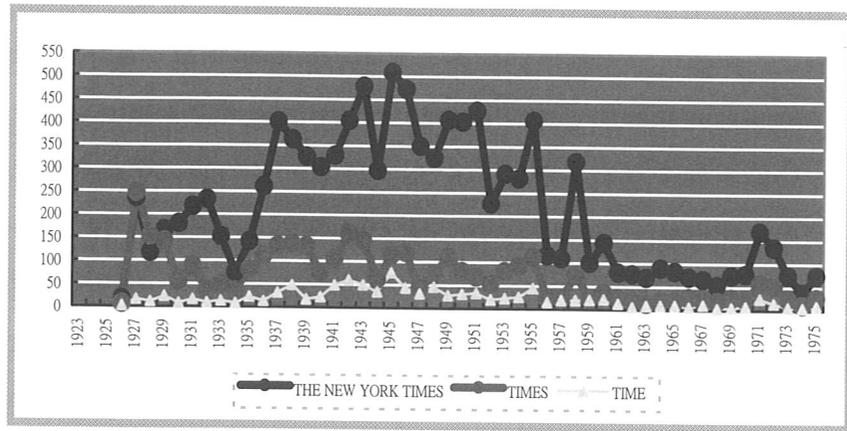


圖 3-4-1：The New York Times, Times & Time 歷年報導蔣中正頻率示意圖（1975 年止）

單位：則

說明：The New York Times: daily

Times: daily

Time: weekly

美國報刊裡的“Chiang Kai-shek”：

對於 Time, Life 與 The New York Times 的基本調查